



学科综述

2015 年国际发展经济学综述

孙靛莹、宋锦、杨灿、朱丹丹*

【内容提要】 本文从两个方面回顾了 2015 年经济发展领域的研究进展。其一，经济发展与就业方面的主要话题有五：宏观经济形势与劳动力市场、贸易对就业的影响，就业匹配，工资决定，收入分配以及移民。其中，微观就业匹配和贸易的就业效应是国际文献的关注重点，工资决定、收入分配和移民则是国内文献的关注重点。其二，在发展援助研究方面，发展援助的动因、效果、运作、“一带一路”与中国对外援助、气候变化援助是国内文献的关注焦点，援助的有效性以及援助的分配则是外文文献的主要关注点。

【关键词】 经济发展 就业 发展援助

近年来，经济发展领域的文献层出不穷，涉及经济发展、城镇化、就业、气候变化等诸多方面，且讨论的问题往往非常复杂，与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甚至生物学等许多学科进行交叉，分析时多引入数学、统计学甚至医学的方法。本文主要回顾了经济发展领域中的经济发展与就业和发展融资两个方面问题。发展经济学家对就业、劳动力市场以及相关的社会保障、城镇化、歧视等方面的讨论层出不穷，但国际和国内的关注点又略有差异。据此，本文主要关注国际顶尖和国内认可度较高的期刊各十份^①。为了反映研究的趋势性，本文先梳理了最近五年的话题分布情况，然后具体回顾 2015 年的文献。

一、经济发展与就业

综合而言，最近五年国际国内在劳动力市场和就业领域的文献可大致分为宏观经济形势与劳动力市场、贸易对就业的影响、就业匹配问题、工资决定和收入分配以及移民五个方面。

* 孙靛莹、宋锦，分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和副研究员，Email 信箱分别为 sunjy@cass.org.cn 和 songjin@cass.org.cn；杨灿，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Email 信箱为 kawayican@sina.com；朱丹丹，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博士后，Email 信箱为 chidaobingyu@126.com。宋锦和杨灿撰写“经济发展与就业”部分，孙靛莹和朱丹丹撰写“国际发展援助”部分。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建设性意见，并自负文责。

① 包括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Econometrica*,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China and World Economy*, 以及《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世界经济》、《经济学（季刊）》、《管理世界》、《世界经济与政治》、《国际经济评论》、《中国工业经济》、《中国农村经济》、《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每一个方面又有若干话题得到关注。例如对就业政策的讨论中，对就业规范和就业促进政策的评估和对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的影响评估是两类话题；对移民问题的讨论中，迁移决策和移民的就业机会与报酬是两类话题。五个方面的研究相互关联，很多话题也存在交叉性。我们对文献的划分反映了文章讨论的主要问题或者对哪个领域做出主要贡献。整体而言，讨论就业匹配问题的文献共 28 篇，涉及的问题包括就业流动性（跳槽）、新晋就业者的就业匹配、失业、女性就业决策等，其中 3 篇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1 篇发表在《计量经济学》，这些文章都非常具有影响力；讨论贸易对就业影响的文章在最近五年有 22 篇，除 2 篇高质量的 NBER 工作论文外，已有 3 篇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 篇发表在《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a*），体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从数量来看，这两个领域重要文献的数量占就业领域总体讨论的三分之一以上，充分体现了学界对这些问题的关注程度。

表 1 最近五年劳动力市场和就业文献的话题分布和趋势 单位：篇

国际期刊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宏观经济形势与就业	0	2	2	0	0
贸易对就业的影响	1	2	3	4	2
就业匹配问题	0	4	3	7	3
工资决定和收入分配	2	2	1	4	0
移民	2	0	0	4	1
国内期刊					
宏观经济形势与就业	3	0	5	0	5
贸易对就业的影响	3	1	1	4	1
就业匹配问题	1	2	2	4	2
工资决定和收入分配	1	5	5	5	4
移民	1	5	7	3	2

就数量而言，国际和国内的讨论关注点略有差异。在国际上，就业匹配问题和贸易对就业的影响是近年来学界着重关注的领域，发表数量占近五年发表数量的一半；在国内，工资决定与收入分配和移民问题则是学界讨论的热点。这种国际国内关注点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与经济背景差异相关。就全球经济与就业形势而言，全球经济放缓、结构转型、贸易模式改变是发达与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问题，失业总量持续增加，就业质量存在显著差异，技能匹配问题日趋严重，就业安全性不足，就业收入增长有限，在这种大背景下，就业匹配问题和贸易对就业的影响是国际上研究的当然热点问题。就中国而言，近年来，中国已进入了一个“新常态”的发展阶段，经济增长速度显著下降，人口老龄化加剧，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规模日趋稳定，但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不高导致劳动与资本的配置仍然缺乏效率，与此同时亟待进行的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涉及收入分配、深化城镇化、应对老龄化、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就业能力等多个方面，工资决定与收入分配以及移民问题是中国国情下就业领域面临的最为关键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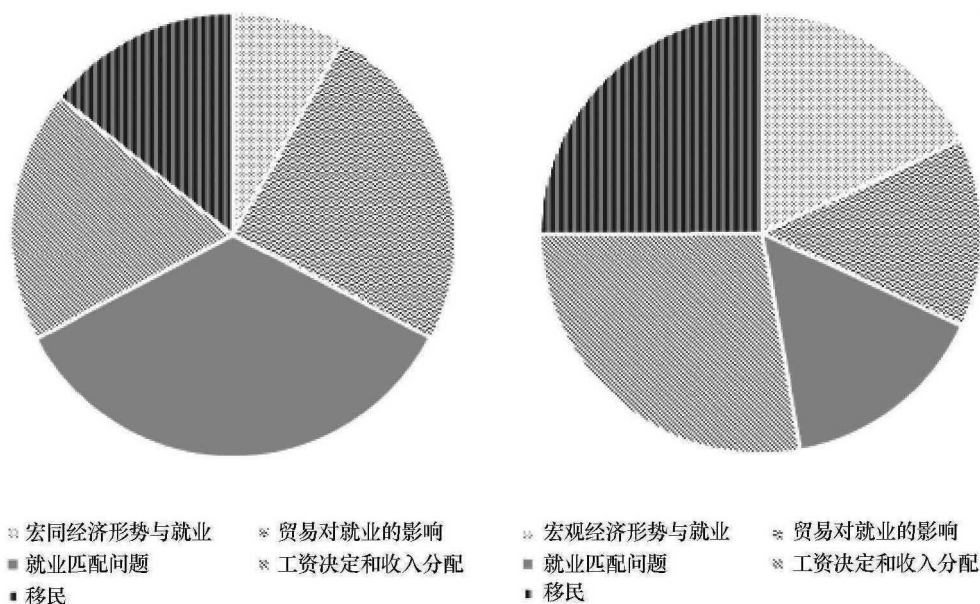


图1 最近五年经济发展和就业文献的国际国内话题分布比较

（一）宏观经济形势与就业

卢锋（2015）考察了劳动力市场指标与宏观经济周期之间的相关性，将农业劳动力转移指标引入传统的奥肯定律，提出广义奥肯定律。^① 通过建立理论模型，文章指出劳动力市场与宏观波动的关联方式，不仅取决于标准模型强调的失业率指标，而且受制于不同国家所处发展阶段的特点以及农业劳动力转移对经济成功贡献的相对重要性。在我国以及广大尚未完成劳动力转移的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市场与宏观经济表现的相关性体现出体制转型特定发展阶段的结构性特点。农业劳动力转移可能比失业率更能解释宏观经济周期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相关性，劳动力转移比充分就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更加重要。文章用中国等 100 多个国家的数据，特别是将全球经济体划分为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充分验证了广义奥肯定律的解释力。

都阳（2015）认为，发展中国家的重要特征是二元经济。二元经济存在生产要素市场不完善、要素价格形成机制不健全的特点，这使得新古典机制难以充分发挥作用，劳动力市场不能按照供求规律形成均衡的市场价格，劳动力市场难以出清，剩余劳动力长期存在。^② 然而，从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人口结构变化使劳动力短缺、普通工人工资快速上扬，劳动力市场供求性质已经变化。作者用主要粮食作物的平均雇工价格反映农业劳动力投入的平均成本，以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监测调查的农民工工资反映非农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水平，发现两

^① 卢锋（2015）：“劳动力市场与中国宏观经济周期：兼谈奥肯定律在中国”，《中国社会科学》，第 12 期，第 69 - 89 页。

^② 都阳（2015）：“低生育率时代的经济发展：结构、效率与人力资本投资”，《国际经济评论》，第 2 期，第 120 - 133 页。

者自 2001 年以来明显趋同。以这两者之间的差推断劳动力从农村向城镇地区转移带来的生产率改善,发现这种改善自 2004 年以后不断下降,通过劳动力转移提供经济增长动力已经很难依赖,持续投资只会带来资本报酬递减,使经济发展受到制约。作者得出的结论是,在中国当前阶段,二元经济理论所描述的分割劳动力市场已经打破,提升经济效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发展经济的唯一途径。具体而言,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进一步发展,需要更高阶段的经济结构转型。这包括制造业、服务业等非农产业部门的细化和多元化、产业内各部门间的要素流动、技术进步带来的技术效率改善,以及劳动力素质的提升。这要求要素市场发达、企业反应灵敏以及劳动者训练有素。中国的人力资本具有队列效应,为劳动者质量替代数量提供经济发展动力存在可能性。

汪仕凯(2015)从劳工治理的角度综合回顾了近年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就业方面面临的主要问题。^①作者认为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发展和新兴工业国家综合国力的壮大,欧美国家的劳资双方的就业冲突在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再次兴起。传统意义上,资本与劳动进行协调的做法包括资本跨国转移;通过生产重组、转型升级和垂直管理削弱工人的谈判地位,分化关键岗位和普通岗位工人的利益体;将工人纳入利润分配、参与管理,增进生产认同感;通过福利制度使劳动者的生存与生产过程剥离,以制度途径将一部分利润从资本方让渡到劳工方,平衡双方的利益冲突等等。然而近年来,全球劳工治理面临几个关键挑战,包括以下几点。第一,随着新兴工业国家的经济实力不断提升,资本通过跨国转移节省福利成本的空间大大缩小,福利制度完善是新兴经济体的必经阶段,发达经济体的福利制度改革也变得迫切。然而福利制度是劳工的共同利益,改革福利制度使劳资双方的冲突趋于急迫。第二,发达国家从 20 世纪 70 年代经济危机开始面临经济发展的困境,工人失业率持续高居不下。福利制度保障的失业救济和技能培训使公共财政负担严重,而现有的福利制度格局使资方难以进行灵活积累,从而推动经济发展,创造就业机会,外来劳工的涌入使本国劳工拒绝对现有福利制度进行阶段性改革,避免在长期中失去就业机会和福利。劳资双方利益冲突激烈。第三,在发展中国家的劳工运动日渐发展的近年来,发达国家从发展中国家向本国回潮,这给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带来就业机会,也重新诱发了发达国家劳资冲突的白热化。第四,在新兴国家,政府为了吸引外资涌入对劳工利益诉求的限制,也引发了劳工管理问题。由于政治利益的存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应对劳工治理的过程中也面临承担治理成本的地位差别。

吕世斌和张世伟(2015)讨论了不同技能水平的劳动力规模变化。^②文章首先根据 OECD 的行业划分标准,将制造业分为高技术、中高技术、中低技术和低技术四类,用 1998—2009 年的就业数据进行分析,发现高技术和低技术的行业就业规模有所扩大,也即劳动力规模表现出“极化”现象,随后统计了不同行业平均工资的变化,发现技能水平在“两极”的就业者工资增长更大;文章随后用行业面板数据分析了就业规模的影响因素,发现外包阻碍高技术行业的就业增长,但促进低技术行业的就业增长;研发则相反,促进高技术行业的就业增长,但替代了低技术行业的就业增长;微电子设备的使用对就业有替代作用。

^① 汪仕凯(2015):“全球劳工治理:议题、机制与挑战”,《世界经济与政治》,第 8 期,第 66—87 页。

^② 吕世斌、张世伟(2015):“中国劳动力‘极化’现象及原因的经验研究”,《经济学(季刊)》,第 2 期,第 757—778 页。



袁志刚和高虹(2015)指出,工业的发展会带动服务业就业,随着工业化完成,制造业的吸附能力下降,服务业会成为低技能劳动力的主要吸附部门,城市制造业就业每增加1%,服务业就业会上升0.435%。^①由于地区间经济集聚效应存在差别、劳动力供给弹性存在制度性差异、服务业发展面临最低消费门槛约束、城市化水平提高会带来消费习惯改变等,制造业的就业乘数效应在地区间会存在差异。跨地区对比显示,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和城市规模的扩大,会对制造业就业的乘数效应产生促进作用。只有在城镇化和城市规模达到一定水平的地区,制造业就业的扩张才会显著地促进服务业就业的增长;而在城镇化和城市规模不足的地区,制造业的就业乘数效应不显著。文章同时对服务业类型做了区分,发现生活性服务业的上升幅度最高,公共服务业就业扩张有限。文章的主要结论是,城镇化发展滞后和城市集聚不足会抑制制造业就业对服务业就业的溢出效应;公共服务业需要提高市场化程度,才能更好地吸收制造业对其带来的就业扩张效应。文章对数据处理的主要发展是为了控制服务业对制造业的就业溢出效应和其他遗漏变量的外生影响,构建了制造业就业变化的工具变量,以全国出口总额的变化和到重要港口的最近直线距离相除,得到城市在特定年份所受到的出口冲击,文章假设这一冲击主要对制造业产生影响而对服务业没有影响。

(二) 贸易对就业的影响

Dixcarneiro & Kovak (2015) 考察了贸易自由化对于就业的影响。^②文章将就业者划分为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并分析了贸易外生冲击对于不同技能水平劳动者的考虑。通过巴西20世纪90年代初的数据,文章发现20世纪90年代到2010年之间,贸易自由化确实使高技能水平劳动力受到市场偏好,这种偏好是显著的,但是它的规模却很小。作者建立的模型和方法可广泛应用于住户调查数据并且能够在其他国家做普遍化检验。

Helpman & Itskhoki (2015) 考察了贸易自由化冲击下就业匹配的动态变化。^③通过建立动态均衡模型,文章提出贸易冲击下就业的调整过程不容忽视。贸易带来的就业再匹配效应既存在于行业之间,也存在于行业内不同厂商之间。在长期均衡稳态条件下,工资水平是确定的,与贸易条件不相关且不随时间变化;企业是否留在市场中以及是否做出口的决策与就业摩擦无关,而由贸易条件决定;对产品的消费量与贸易成本、劳动力市场摩擦都相关;出口厂商数量、雇佣总规模由这些变量决定。然而,长期均衡需要厂商通过调整逐渐实现。当贸易条件发生变化,由于存在招聘产生的沉没成本,厂商可能不会根据新的最优雇佣规模即时调整雇佣水平,一些企业立刻裁员或完全裁员(也即退出市场),一些企业则利用外生的人员自然流失等逐步减小雇佣规模。这些调整决策与厂商的生产率有关。在调整过程中,雇佣水平与最优雇佣规模相背离,支付的工资与均衡工资也出现差异,出口厂商和生产率较高的非出口厂商保持工资水平不变,而低生产率的厂商会削减工资,并在雇佣规模逐渐下降时逐步提高工资水平。就业者被假设为完全同质,在就业冲击下,每个就业者面临的就业和收

^① 袁志刚、高虹(2015):“中国城市制造业就业对服务业就业的乘数效应”,《经济研究》,第7期,第30-41页。

^② Dixcarneiro, R. & Kovak, B. K. (2015).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the Skill Premium: A Local Labor Markets Approac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5 (5), 551-557.

^③ Helpman, E. & Itskhoki, O. (2015).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Labor Market Dynamics with Heterogeneous Firms (No. 199161).

入前景完全由所在单位的处境决定。由于这些生产率较低厂商的存在, 就业向新的稳态调整的过程被放缓, 这挤出了生产率较高的新进入者, 也因此压低了整个贸易部门的平均生产率。就生产而言, 贸易自由化发生后, 出口因此增加, 但增加的过程是逐步的; 就家庭而言, 由于家庭的效用水平与对国内产品和出口产品的消费量相关, 贸易自由化使贸易品价格下降, 家庭得到福利改善, 但这种福利改善会被工资水平的降低和就业水平的降低部分抵消。模型所依赖的关键假设包括劳动力供给足够大从而就业者始终不能出清、劳动力完全同质, 非出口产品完全同质、出口产品存在差异、对出口产品的消费具有不变替代弹性, 出口部门企业的生产率高于非出口部门、进入贸易部门存在一次性沉没成本等。

Helpman 等 (2015) 考察了贸易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① 文章首先建立了结构动态均衡模型, 模型以 Helpman 等 (2010) 为基础, 引入了厂商之间差别化的甄别成本和出口的固定成本, 厂商雇佣规模、协议工资、厂商利润水平和出口决策在一般均衡条件下都是确定的。通过对约化系数 (Reduced-form coefficients) 的估计, 模型不能够完全识别结构参数, 但是不影响考察贸易对于工资差距的影响。文章考察的反事实情况包括自给自足、出口的固定成本变化、出口的可变成本变化、对就业和工资的冲击的离散程度发生变化。

张川川 (2015) 将进出口贸易数据结合普查和小普查中地级市的就业结构, 估算了各地市的人均出口额, 并以此为关键变量考察了出口对就业、工资和收入不平等的影响。^② 结果显示, 2000—2005 年间的出口增长显著提高了制造业和服务业就业占比, 并且出口增长对年轻人、低学历人口、农村户籍人口和女性的就业影响更显著。进一步研究显示, 出口显著提高了在业者的收入水平, 降低了城市内部的收入不平等。相比之下, 进口变化没有显著的就业和工资效应, 但进口显著增加了城市内部的收入不平等。

(三) 就业匹配问题

Coles & Mortensen (2015) 通过工作搜寻中的信息不对称解释了企业工资的差异和企业雇佣规模的变化。^③ 在就业过程中, 厂商在生产率上具有差异, 厂商了解这种生产率的差异, 而就业者不了解生产率的真实水平。不同生产率的企业对就业者工资的支付能力不同。在均衡状态下, 就业者会从生产率较低的企业跳槽至生产率较高的企业, 从而获得更高工资。对于生产率较高的企业而言, 他们有动机提高工资, 以降低员工流失率。因此在均衡状态下, 不同企业间的工资差异会有所扩大。更进一步, 由于支付较高的工资、员工流失率较低, 并且有生产率较高的新员工加入, 生产率较高的企业会不断扩大, 且预期工资增长率为正值。模型对企业的工资和生产率特点进行了解释, 也比较了不同失业率环境下, 劳动者的再匹配成本存在差别, 从而解释了不同失业水平下的企业工资分布差异和规模变化差异。

Kaas & Kircher (2015) 讨论了企业规模对劳动者工资的影响。作者提出平均产出与边际

^① Helpman, E., Itskhoki, O., Muendler, M. & Redding, S. (2015). Trade and Inequality: From Theory to Estimation,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forthcoming).

^② 张川川 (2015): “出口对就业、工资和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基于微观数据的证据”, 《经济学(季刊)》, 第4期, 第1611—1630页。

^③ Coles, M. G. & Mortensen, D. T. (2016). Equilibrium Labor Turnover, Firm Growth, and Unemployment. *Econometrica*, 84 (1), 347—363.



产出是有差异的, 新兴企业不仅提供了大量的职位空缺, 他们也提供更高的工资来吸引就业者。^① 在这种情况下, 生产率更高的就业者因此得以被匹配到空缺职位上, 这与经验发现是一致的。

Gayle et al. (2015) 考察了管理人员劳动力市场上的识别问题, 并用管理人员与企业的匹配面板数据检验了就业匹配中的风险、人力资本、职业规划、谈判和市场竞争因素等的影响。^② 文章指出, 管理人员的就业决策是动态的, 他们会平衡长期职业规划, 这种长期收益的考虑超过了短期的薪酬收益。文章认为, 管理人员会考虑薪酬水平、非货币收益和人力资本积累的未来收益而做出是否接受工作的决策和相应的努力程度。这种决策是私人信息, 并且可以成为道德风险的来源。工作的努力程度可以被理解为人力资本投资的成本, 其货币化体现是管理人员接受薪酬水平较低的岗位。文章发现, 寻求更多人力资本投资价值使管理人员能够接受的薪酬水平降低, 但跳槽率因此上升; 这种效应随年龄和经验递减。根据文章的模型可以推断, 职业规划能够改善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目标差异, 这种改善作用在中层管理人员身上最为明显。人力资本较高的管理人员会被给予更高的职位, 并且被支付更高的工资。就业匹配过程中对薪酬的定价包括了风险防范溢价, 管理人员的风险防范收益随着企业规模和职位层次的变高而增加。

Mao & Xu (2015) 指出, 结构转型理论通常情况下假设需求方内部、供给方内部具有同质性。^③ 然而, 需求方和供给方是存在异质性的, 不同劳动者在不同部门之间转换工作的可能性存在差异。文章使用 1986—2009 年的中国城镇住户调查数据建立了一个个人层面的长周期面板数据。文章发现, 在哪个部门就业很大程度上由劳动者的个人特征决定, 这种影响在初次就业和跳槽再就业都是显著的。特别是女性、受教育水平较高和前期的白领工作经验等特征会使劳动者更有可能进入第三产业工作, 而较少进入第一产业工作。在结构转型的宏观经济变量发生变化时, 这种影响也是显著的。在不同周期、更细的行业划分时, 这种效果都很稳健。

Farber & Valletta (2015) 利用美国 2000—2005 年和 2007—2012 年人口调查的数据考察失业救济金对失业的影响。^④ 通过控制各州经济条件和个体特征, 基于个体差异考察失业持续时间与失业救济金期限之间的关系。发现失业救济金会减少失业者再就业的比率, 增加失业持续时间, 虽然上述影响较小, 但均显著存在。

李树与陈刚 (2015) 检验了劳动力的自评幸福感取值对其是否就业、是否非正式就业的影响, 认为幸福感上升显著地提高了劳动力的就业概率, 也提高了失业劳动力实现隐性再就业的概率。^⑤ 文章克服结果变量对自评幸福影响的方法是以各城市的平均气温及其平方作为

① Kaas L. & Kircher, P. (2015). Efficient Firm Dynamics in a Frictional Labor Market.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5 (10), 3030 - 3060.

② Gayle, G. L., Golan, L. & Robert, A. Miller. (2015). Promotion, Turnover, and Compensation in the Executive Labor Market. *Econometrica*, 83 (6), 2293 - 2369.

③ Mao R. & Xu J. (2015). Labor Market Dynamics and Structural Change: Evidence from China. *China & World Economy*, 23 (4), 60 - 83.

④ Farber, H. S. & Valletta, R. G. (2015). Do extended unemployment benefits lengthen unemployment spells? Evidence from recent cycles in the US labor market.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50 (4), 873 - 909.

⑤ 李树、陈刚 (2015): “幸福的就业效应——对幸福感、就业和隐性再就业的经验研究”, 《经济研究》, 第 3 期, 第 62 - 74 页。

幸福感的工具变量。在幸福感对就业状态的影响机制上,文章以工资水平度量生产率、以劳动者获得工作的渠道是否私人介绍来识别社会资本,提出幸福感对劳动力就业概率的影响没有增加生产率,但可能通过增加社会资本来完成。文章同时以是否正在搜寻工作代理劳动者搜寻工作的努力程度,认为幸福感会促进劳动力的工作搜寻努力,且这种影响随幸福感上升而递增。

魏下海等(2015)利用2012年全国民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考察企业的雇佣期限对劳动力市场就业稳定性的影响。^① 结果发现工会可以通过集体发声,与基层党组织协同引发党政关注影响企业雇佣。另外,工会可以显著改善企业雇佣期限结构,即增加企业长期雇佣的比重,减少短期雇佣和临时雇佣的比重。他们提出短期用工方式虽然促进就业灵活性,但是用工不规范也会影响到就业的稳定性。在我国劳动力市场进入转型的关键时期,长期雇佣带来的就业稳定性至关重要,研究也表明工会在这方面确实发挥了积极作用。

(四) 迁移决策

Hainmueller et al. (2015) 对美国12个不同行业的员工进行调查,考察选民反移民情绪是否出于移民对劳动力市场竞争影响的考虑。^② 研究发现,移民对劳动力市场竞争的影响并没有影响到当局者对待移民的态度以及相关的移民政策。这不同于以往的研究,通过对选民进行调查得到选民出于移民对工资和就业的负面影响的担忧,从而产生反移民情绪的结论。Ruiz & Vargassilva (2015) 则运用1991—2010年喀格拉河健康与发展调查数据研究移民潮对移民国各行业劳动力市场的影响,结果发现移民聚集地的当地居民更容易进入有养老金补贴的政府部门和专业化岗位。^③ 除了研究移民对当地居民就业和工资的影响以外,还有学者也分析了移民对移民者就业和工资的影响。

彭国华(2015)通过构建匹配理论模型考察我国地区经济差距形成的原因,并对地区经济差距与劳动力流动进行分析。^④ 由于劳动力的技能水平和工作岗位的技术含量各不相同,技能水平越高的劳动者匹配的工作岗位技术含量越高。开放后中西部与东部地区在技术岗位方面的差距主要是由于对劳动力流动性质的放松。他提出中西部地区应当提高基础设施建设,吸引更多能够提供技术岗位的企业落户,从而减少与东部地区在技术水平上的差距。除此之外,他还解释了民工荒与产业转移现象。由于存在劳动力流动成本,随着西部技术岗位的扩充,技能水平相对较低的农民工可以在本地区就业而不用流动到东部沿海地区,由此导致东部地区民工荒现象。

陈雪原(2015)将农村集体土地要素纳入刘易斯二元模型中,在一般均衡的视角下,引

① 魏下海、董志强、金钊(2015):“工会改善了企业雇佣期限结构吗?——来自全国民营企业抽样调查的经验证据”,《管理世界》,第5期,第52—62页。

② Hainmueller, J., Hiscox, M. J. & Margalit, Y. (2015). Do Concerns About Labor Market Competition Shape Attitudes Toward Immigration? New Evidence. *SSRN Electronic Journal*, 97 (1), 193—207.

③ Ruiz, I. & Vargassilva, C. (2015). The Labor Market Impacts of Forced Migr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5 (5), 581—586.

④ 彭国华(2015):“技术能力匹配、劳动力流动与中国地区差距”,《经济研究》,第1期,第99—110页。



入土地市场与劳动力市场进行分析,提出“双刘易斯二元模型”假说。^①在以往“共有”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下,农村劳动力在转移时难以对集体资产进行充分处置,难以突破市民化的高成本门槛。他提出让农民带资进城,将集体产权结构由共同拥有转向按分拥有,从而加快农民市民化进程。这篇文章还提出,在转型经济中,不仅劳动力供给存在刘易斯转折点,农村集体土地供给也存在一个由充裕到稀缺的转折性变化。最后,文章还以“中科电商谷”作为典型案例进行分析,构建让农民“带资进城”的可能路径及制度安排。

(五) 工资决定与收入分配

宋扬和赵君(2015)^②主要考察劳动收入对减贫的影响机制,利用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CGSS)对我国贫困的现状、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详细分析。通过采用家庭等值规模调整方法重新估算我国贫困程度,分别使用logit和tobit模型分析影响贫困的各个因素。结果发现,按照家庭规模和人员结构进行等值规模调整后的贫困率为5.8%,是不经过调整时的一半。研究还发现劳动收入有利于家庭脱贫,家庭中就业人数和工资水平越高,发生贫困的概率越低,增加家庭的劳动收入可以帮助其摆脱贫困。

郭凯明、颜色(2015)^③利用2010年CFPS数据从就业、工资、晋升和福利等方面考察同工同酬政策和保障就业平等政策对女性工人的影响。结果发现同工同酬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消除性别工资差距,但也会提高女性工人晋升门槛,从而使得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的女性工人失业,而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女性工人晋升速度下降。通过分析同工同酬和保障就业平等的政策对女性就业、工资等方面的影响,发现这两种政策都不是帕累托改进的政策,同时要求同工同酬和保障就业平等介于自由市场和仅要求同工同酬政策之间。另外,通过对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数据进行模拟分析,发现仅要求同工同酬只能改善38.7%的女性工人福利,而同事要求同工同酬和保障就业平等政策的负面影响较小。

王学龙、袁易明(2015)^④使用1989—2011年中国家庭健康调查数据(CHNS),采用Altham指标和反事实分析方法,考察不同年龄群组代际流动性变化趋势及原因。结果发现,我国城镇居民代际流动性在群组间呈现先降后升的趋势,即1960—1970年出生的人群代际流动性最高,1970—1980年出生的人群代际流动性最弱,1980—1989年出生的人群代际流动性居中。通过分析发现教育是影响职业阶层的最重要因素,且随时代演进其作用不断增强。教育不平等对不同年龄群组的代际流动性变迁有重要影响,对70后代际流动性下降的解释程度更强。教育不平等主要来源于家庭背景差异对子女受教育的影响、国内教育体系不平等的程度以及教育在劳动力市场中的重要性。

陈钊、马净冰(2015)使用2010年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数据,分析教育回

① 陈雪原(2015):“关于‘双刘易斯二元模型’假说的理论与实证分析”,《中国农村经济》,第3期,第34—43页。

② 宋扬、赵君(2015):“中国的贫困现状与特征:基于等值规模调整后的再分析”,《管理世界》,第10期,第65—77页。

③ 郭凯明、颜色(2015):“劳动力市场性别不平等与反歧视政策研究”,《经济研究》,第7期,第42—56页。

④ 王学龙、袁易明(2015):“中国社会代际流动性之变迁:趋势与原因”,《经济研究》,第9期,第58—71页。

报与受教育地点之间的关系,通过控制地区生活水平、户籍身份和职业行业等影响因素后,经济发达地区接受高等职业教育的人力资本回报显著高于其他地区。^①因此,他们提出通过鼓励经济发达地区外来人口就读高等职业教育,可以提升城市产业工人的人力资本含量,有利于我国产业升级及农民工真正实现“市民化”。虽然文章无法区分职业教育回报差异究竟是由于东部地区具有较高的师资配备,还是东部地区劳动力市场供求匹配效率更高。但无论是哪种原因,放开东部地区职业教育户籍门槛都具有现实意义。

二、国际发展援助

2015年共有56篇核心文章讨论国际发展援助,其中33篇中文文献,23篇英文文献。中文文献主要讨论五个方面的议题,包括三个传统议题,即援助的动因、援助的效果、援助的运作以及两个新议题——“一带一路”与国际援助以及气候变化援助,分别有12篇、12篇、7篇、2篇、2篇文献。其中,援助的动因主要分析美国(2篇)、欧盟(1篇)、日本(3篇)、中国(6篇)的对外援助战略;援助的效果包括援助与经济增长、援助与贸易投资两方面,分别有4篇和8篇文献;援助的运作包括援助管理体系和援助政策,分别有5篇和2篇相关文献。在23篇英文文献中,有19篇讨论援助的有效性,具体包括10篇援助与经济增长的文献、3篇援助与贸易投资问题、4篇援助与民主政治文献、3篇援助政策协调与有效性文献。其余4篇讨论援助的配置问题,即援助国援助供给决策会受到施受双方哪些因素的影响。目前,国内关于国际发展援助的研究议题大致包括传统主题和新主题两大类。传统主题主要分为援助的动因、援助的效果以及援助的运作,新主题包括“一带一路”与国际援助、气候变化援助。

(一) 国内发展援助文献

1. 援助的动因

援助的动因解决的是援助为什么会发生的问题,即援助国提供援助的原因是什么,这是一个自援助产生之初就被讨论的问题。总体来讲,援助之所以会产生,主要是为了获取一定的利益,包括援助国和受援国的潜在利益。从受援国的角度来讲,援助是为了弥补受援国的发展资金不足的困境,帮助其实现经济增长和减贫,从而推动其落实千年发展目标;从援助国的角度来讲,则是为了获取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利益。

笔者分析发现,现有文献主要还是集中于从援助国自身的利益出发,探析援助的动因。罗会钧和黄梦佳(2015)^②、沈鹏和周琪(2015)分别研究了美国对非洲、对以色列和埃及的援助政策。其中,罗会钧和黄梦佳(2015)指出,对外援助作为国家进行外交的重要手段,在维护国家利益、实现外交政策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位置;进一步地,他们分析指出,美国对非洲的援助分为五个阶段,在不同阶段,美国会根据自身利益和世界形势,对非洲的援助有明显起伏。例如,第一阶段为20世纪50年代初期至60年代初期,为了拉拢广大的第三世

^① 陈钊、冯净冰(2015):“应该在哪里接受职业教育:来自教育回报空间差异的证据”,《世界经济》,第8期,第132-149页。

^② 罗会钧、黄梦佳(2015):“美国对非洲援助研究”,《政治研究》,第6期,第73-75页。



界国家加入其阵线,排挤苏联在发展中国家的势力,美国对非洲的援助力度处于上升期,带有较强的政治目的;但在第三阶段即20世纪80年代,前半段美国出于拉拢非洲国家、孤立苏联的战略,对非洲的援助有了大幅的提升,但后半段由于苏联已经无法与美国争夺霸权,因而对美国而言,非洲的战略地位不再突出,美国对非洲地区的发展援助明显下降;而在第五阶段21世纪初期至今,为打击恐怖主义,并获取非洲较为丰富的能源资源,美国对非洲的援助力度又出现前所未有的急剧上升态势。沈鹏和周琪(2015)强调,美国之所以援助以色列和埃及,主要是希望利用其援助政策来消弭双方之间的冲突,缓和中东地区动荡的局势,以维护美国的能源安全利益;但是在数额和内容上,美国对以色列和埃及的援助还是存在重大差别,显示出美国对以色列的偏袒^①,因为以色列的战略地位更为重要,价值观念与美国更为一致,两者的历史渊源也更为密切。

弘义(2015)^②在分析欧盟对非洲援助政策时指出,进入21世纪,欧盟对非洲的援助政策处于不断的调整之中。这既是出于自身发展和对外政策的需要,也是由于非洲日益重要的战略地位、其他对非援助力量的竞争压力等外部形势的变化。具体而言,就是希望借助和发展其与非洲的传统关系以提高自身在全球的影响力和话语权,维持欧盟东扩后的内部稳定,谋求非洲丰富的能源资源和巨大的市场及廉价劳动力等。他还进一步分析了其他援助国对非援助的动机,从传统援助国看,美国加强对非援助,既有传统的发展、良治、民主、稳定的考虑,也有新的原因,如获取石油、反恐、全球战略竞争等因素;为了争取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获取非洲丰富的资源和市场等,日本对非洲的援助也不断增加。从新兴援助国看,近年来,尤其是2001年之后,俄罗斯进一步增加了对非洲的援助力度,其援助领域主要是能源部门和采矿业;巴西对非援助主要集中在葡语国家,同时还与其他援助国在非洲开展三方合作;印度不仅继续努力扩大其地区影响力,还积极谋求大国地位争取“入常”,同时为了获取能源和开拓市场、扩大贸易,对外援助成为印度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非洲成为印度的重要援助对象;中国与非洲的合作也日益深化。

作为全球发展援助领域举足轻重的援助国,日本对外援助的政策和动机也备受关注。整体来讲,学者们普遍认为,日本的对外援助政策太过于注重本国的利益,缺乏对受援国利益的考量。朱艳圣(2015)^③通过分析得出,日本官方发展援助具有明确的战略意图,即服务于日本的经济与安全目标。在经济上,日本借助于官方发展援助开拓海外市场、促进经济发展;在安全上,官方发展援助服从和服务于日本自身及其盟国美国的安全和战略需要,也是实现其外交战略目标的有力手段。日本的对外援助充分反映出其对外政策的国家利己主义。这种明显的利己主义色彩也得到了其他文献的佐证。例如,韩召颖、田光强(2015)^④指出,在缅甸着手推进政治改革后,日本随即重启了对缅甸的日元贷款项目,这标志着日本对缅甸的官方发展援助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这一转变的背后有着深远的战略考量:推动缅甸的民主化进程、提升日本在缅的战略影响力以及打开缅甸尚未完全开发的市场。不仅如此,日本

① 沈鹏、周琪(2015):“美国对以色列和埃及的援助:动因、现状与比较?”,《美国研究》,第2期,第9-31页。

② 弘义(2015):“欧盟对非洲援助政策调整及其前景”,《国际研究参考》,第10期,第1-7页。

③ 朱艳圣(2015):“日本政府开发援助背后的战略分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第5期,第127-133页。

④ 韩召颖、田光强(2015):“试评近年日本对缅甸官方发展援助政策”,《现代国际关系》,第5期,第33-40页。

政府 2015 年通过了修订后的《官方发展援助大纲》，新大纲对日本的对外援助政策进行了重新定位，指出日本对外援助的目的是“为国际社会的和平、稳定和繁荣做出更积极的贡献，也将有助于确保日本的国家利益”。这是日本首次在对外援助政策文件中公开使用“国家利益”字眼，并明确提出援助行为将服务于以下国家利益：保障本国和平与安全、促进经济繁荣、营造稳定透明和可预见的国际环境、维护基于普世价值观的国际秩序。^①

近几年来，中国已经由援助国和受援国的双重角色转变成完全的援助国，在国际发展援助领域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因而中国的对外援助开始受到国内外各界的关注。西方发达国家经常指责中国的对外援助是一种新殖民主义，即以资金、设备、劳务输出为代价，换取非洲价格低廉的原料和占领非洲市场。某些受援国也认为，中国的对外援助带有很明显的利己主义色彩，其目的是为了获得自身的经济、政治、外交利益。^②但燕雪（2015）^③通过对“新殖民主义”的探究和对于中国行为与“新殖民主义”、西方国家的对非援助或援建行为的比较，指出“新殖民主义”是“中国威胁论”的变异体，中非合作中不存在大国压迫、干涉内政、政治同化等“新殖民主义”的现象，因此中国的对非援助和援建并不是“新殖民主义”。尽管中国对外援助不是西方国家所污蔑的“新殖民主义”，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对外援助在促进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同时，也追求自身的利益，实际上是一种互惠互利的“双赢”方式。正如宋微（2015）^④所指出的，对外援助是中国应该履行的大国责任，同样也是中国对外战略的重要内容，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有益途径。刘洪武（2015）^⑤、李家成（2015）^⑥也认为，当代中国的对非援助与履行国际责任带有明显的自主特色与东方大国的行为特征，它既根植于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与民族精神，又紧紧服务于当代中国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追求民族国家复兴强盛的时代要求与战略目标。基于此，他们还进一步提出了中国对外援助及履行国际责任的如下基本原则。第一，中国是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必须以认真负责的态度来处理国际事务。第二，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承担的国际责任不能超出自身的能力，不做超出国力和力不能及的事。第三，中国不回避应尽的国际义务，但中国承担的国际责任和义务，不是为特定国家或国家集团服务，而是对中国人民负责，对世界负责，对未来负责。第四，随着中国自身力量的增强，中国会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当然，中国对自身利益的追求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新中国伊始，中国确定了“一边倒”的外交战略，其对外援助主要投向了第三世界国家，带有明显的政治和军事动机，目的是为了获取更多的政治支持、扩大社会主义阵营，不考虑经济利益；但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对外援助战略发生变化，从以政治利益为先变为把经济利益作为首要考虑。^⑦

① 姚帅（2015）：“透视日本对外援助新政策”，《国际经济合作》，第5期，第63-66页。

② 卢光盛、李晨阳、金珍（2014）：“中国对缅甸的投资与援助：基于调查问卷结果的分析”，《南亚研究》，第1期，第17-30页。

③ 燕雪（2015）：“驳中非合作是‘新殖民主义论’”，《法治与社会》，第9期（下），第279-287页。

④ 宋微（2015）：“中国对外援助意义的再思考”，《国际经济合作》，第1期，第81-84页。

⑤ 刘洪武（2015）：“对非发展援助与中国国际责任的当代实践”，《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第1-10页。

⑥ 李家成（2015）：“‘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国对外援助政策”，《环球视线》，第11期，第47-49页。

⑦ 唐慧云（2015）：“从政治利益走向经济利益——试析中国对外援助政策的转变”，《探索》，第6期，第234-251页。



2. 援助的效果

援助的效果是指援助是否实现了最初设定的目标,既包括援助国想要得到的利益,如增加本国的海外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也包括受援国旨在达到的发展和减贫目的,如促进经济增长、推进民主化进程、增加本国出口或提高贸易能力等等。整体而言,早期文献对援助国利益的关注很多,而对援助为受援国的经济发展和减贫能够产生的效果却较少论及,近年来才开始有学者从受援国角度展开研究。基于援助的实际效果,政府部门、学者、媒体、受援国当地人民等对国际援助的评价也褒贬不一。

(1) 援助与经济增长和减贫

胡美(2015)^①梳理了已有的关于援助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文献,发现援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不确定。以萨克斯(Sachs)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援助能够促进受援国的经济增长,但以格里芬和伊诺斯(Griffin & Enos)、伯恩(Boone)为代表的学者则研究发现,援助与增长之间呈负相关的关系,援助不是增进而是损害了受援国的经济增长,两个派别之间的争论从未休止。不过,随着1990年代“华盛顿共识”的提出,附加条件的援助引起关注,学者们开始讨论援助的条件性,其中以塔普(Tarp)为典型代表。这些学者指出,援助的效果呈现时空上的差异性,也就是说,援助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会对受援国的经济增长产生的积极影响,援助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受援国的制度基础和公共政策、地理因素、殖民历史以及援助本身的时机、数量、方式等限制条件。关于援助有效性的条件性,刘婷(2015)^②也指出,援助有效性受到施受双方两方面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包括受援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如政策制度、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援助国的数量、援助模式和援助政策、援助国与受援国及其他援助国之间的沟通协调等等。

上述研究主要是以发达国家的对外援助为研究对象,近年来开始有部分学者关注中国对外援助的有效性。例如,1958—1964年,中国对越南援助,虽然只有短短的6年时间,但援助集中在经济领域,规模大,覆盖面广,而且层次高,特别是紧密配合越南三年计划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成效十分显著。^③中国在非洲的医疗援助不仅加深了中非之间的友谊和合作,而且改善了受援国当地的医疗水平,帮助其民众解决病痛,受到了当地民众的广泛赞誉。^④

(2) 援助与贸易和投资

在现行的国际贸易体系下,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面临经济基础设施不完善、贸易信息不及时、外部贸易标准及关税壁垒等各种限制,这些内外部限制阻碍了发展中国家融入世界贸易体系并导致其进一步被边缘化。^⑤2005年,OECD/WB一起提出了“促贸援助”(Aid for Trade, AFT)倡议,希望发达国家提供援助促进受援国的国际贸易发展和贸易能力的提升,进而以贸易为引擎促进受援国的经济增长和减贫。此后,援助与贸易、投资的关系受到越来越

① 胡美(2015):“对外援助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述评”,《武陵学刊》,第2期,第23—32页。

② 刘婷(2015):“中国对非洲援助的有效性分析”,《现代经济信息》,第2期,第120页。

③ 张勉励(2015):“中国对越南经济建设援助的历史考察(1958—1964)”,《史林》,第1期,第151—157页。

④ 蒋华杰(2015):“中国援非医疗队历史的再考察(1963—1983)——兼议国际援助的效果与可持续性”,《外交评论》,第4期,第61—81页。

⑤ 严双伍、唐鹏稿(2015):“促贸援助:国际比较与政策建议”,《长江论坛》,第3期,第49—55页。

越多的关注。但需要指出的是,援助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既包括援助对援助国的贸易影响效应,也包括援助对受援国的贸易影响效应。

从援助国的角度来讲,李丹和陈友庚(2015)^①、王玉红(2015)^②在研究中国对外援助与经贸区建设时指出,对外援助已经成为“中国制造”出口的一种营销手段,有利于扩大中国产品的出口;援助还能够推动 FDI 的增加,中国对非援助对中国的对非直接投资呈现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为了更好地发挥对外援助在经贸合作区建设中的作用,他们建议,中国应从加强对境外经贸合作区东道国的宏观政策援助、实施本地化战略、使用援外优惠贷款支持合作区建设三个方面改革对外援助。胡兵、丁祥平、邓富华(2015)^③基于非洲国家样本的面板数据模型,采用面板分位数回归方法,考察了中国对外援助对其 OFDI 的影响。回归结果揭示,对非援助会促进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投资,且该正面效应随着 OFDI 规模的扩大呈逐渐递减的态势,即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越大,其援助对投资的正向促进效应越小。这就意味着,将对外援助与对外投资等政策结合起来,推动对外援助与对外投资的协调发展,是可行的政策选择。进一步地,黄宁(2015)^④不仅分析了中国对外援助对直接投资的影响效应,而且分析了直接投资对援助的促进作用,即他分析了对外援助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互动关系。具体地,他采用 Granger 因果检验方法,从时间纵向和地区横向两个方面实证检验了中国对外援助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互动关系,发现两者互为 Granger 原因,表明两者之间是互动发展的。进一步而言,对外援助通过“先导效应”和“基础设施效应”等方式提供一些国际公共产品,从而有效地降低 FDI 的预期沉没成本,促进 FDI 流入;反过来,FDI 流入的增加能够有效降低东道国对援助的依赖程度,增强对外援助的补充、减贫和杠杆效应,提高其有效性。最终形成“对外援助有效→FDI 流入增加→对外援助更有效→FDI 流入更多”的良性循环。

从受援国的角度来看,2015 年只有黄梅波和朱丹丹(2015)^⑤、朱丹丹和黄梅波(2015)^⑥研究了国际发展援助对受援国国际贸易发展的影响。其中,黄梅波和朱丹丹(2015)使用 66 个受援国 2002—2011 年间的面板数据,对发达国家的国际发展援助与受援国出口多样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促贸援助”总额和生产部门援助的增加都能够提高受援国的出口多样化水平,经济基础设施援助则对受援国的出口多样化没有显著影响;生产部门援助对出口多样化的影响存在倒“U”型“门槛效应”,“促贸援助”总额和经济基础设施援助则都不存在该效应。基于上述结论,她们进一步提出了政策建议,即在提供

① 李丹、陈友庚(2015):“对外援助与我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开放导报》,第 1 期,第 51—53 页。

② 王玉红(2015):“‘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背景下以援助方式促进内蒙古与蒙古国的经贸合作研究”,《赤峰学院学报》,第 4 期,第 130—132 页。

③ 胡兵、丁祥平、邓富华(2015):“中国对非援助能否推动对非投资”,《当代经济研究》,第 1 期,第 67—73 页。

④ 黄宁(2015):“论对外直接投资与发展援助的互动发展”,《印度洋经济体研究》,第 1 期,第 96—108 页。

⑤ 黄梅波、朱丹丹(2015):“国际发展援助的出口多样化促进效应分析——基于 66 个受援国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财贸经济》,第 2 期,第 97—108 页。

⑥ 朱丹丹、黄梅波(2015):“中国对外援助的贸易成本削减效应研究”,《世界经济研究》,第 7 期,第 100—107 页。



“促贸援助”的过程中，应该注意区分不同类别援助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受援国出口多样化的具体效应，同时要注意援助的“门槛效应”，控制合理的援助数量。朱丹丹和黄梅波（2015）在核算出中国对部分非洲国家援助额的基础上，选取了15个非洲国家2005—2011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方法，检验了中国对外援助对受援国贸易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对非援助可以显著降低受援国的出口和进口成本，且对进口成本的影响效应略大于出口成本。这表明中国所采取的“促贸援助”方式是非常有效的，应该进一步坚持这种援外方式并增加对外援助额。

王丽（2015）^①同时从援助国和受援国两个方面分析了中国的对外援助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她指出，援助会通过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对双边贸易产生影响，使受援国与援助国的双边贸易总额呈增长趋势。援助的直接效应会通过两种形式增加援助国的出口。一是直接的物质援助，可直接带动援助国该类产品的出口。二是在政府优惠贷款和合作项目基金的支持下，援助国企业到受援国建设合作项目，由项目带动援助国相关设备和材料的出口。外溢效应是指援助可以促使援助国的企业提高产品质量，改善出口商品的结构，增强产品的国际知名度，便于开拓世界市场，从而增加援助国的出口；与此同时，对外援助还会通过“促贸援助”等方式推动两国建设双边自由贸易区，这会使两国之间的市场更加自由开放，受援国可以享受更多的优惠政策，其对援助国的出口会随之增加，从而贸易逆差也会缩小。

通过考察已有文献，可以得知，学者们在研究援助对贸易、投资的影响效应时，主要还是更为关注援助国可能获得的收益，对于受援国可能的收益重视不足，这与现实的援助实践比较相似。然而，国际发展援助最根本的目标应该是促进受援国的发展和减贫，受援国自身的发展反过来也将促进援助国的出口和增长。已有研究曾指出，过于关注援助国的收益并不能提高双方的整体收益，只有兼顾施受双方的收益才能实现帕累托最优。因此，未来的援助应该同时探究援助对受援国和援助国的国际贸易和FDI的影响效应，找到双方能够相互促进，形成良性循环的方案。

3. 援助的运作

为了提高援助的有效性，必须注重援助的实际操作，包括对外援助的管理制度和具体的援助政策两个方面，下文我们也主要是从这两个方面对已有文献展开讨论。

（1）援助的管理制度

由于中国一直缺乏系统、完善的援助管理制度，因此现有文献主要是研究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英国等）的援助管理制度，以为中国对外援助的管理提供借鉴。整体而言，对外援助管理的总体框架包含援助的法律基础、援助的组织和管理机构框架、政策一致性、援助的监督与评估等等。在援助的法律基础方面，美国是最早实现对外援助机制化和法制化的国家之一。孙明霞（2015）^②建议，中国应该制定专门的《对外援助法》，明确规定对外援助的范畴、宗旨、原则、方式等。同时，《对外援助法》应该随着国际形势和中国的发展需求不断调整。在制定《对外援助法》的基础上，还应制定一些内容具体且针对性强的行政法规、管理办法等规范性文件来指导对外援助的事务性工作。但是，这些规范性文件不能与《对外援助法》相冲突或重叠，而应作为《对外援助法》的补充来满足对外援助工作的实时

^① 王丽（2015）：“国家援助及双边贸易的效应分析”，赤峰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第4期，第160-162页。

^② 孙明霞（2015）：“美国对外援助机制及其对中国的启示”，《国际展望》，第4期，第136-156页。

立法需求。

在援助的组织和管理机构框架方面,田文(2015)^①对比分析了中国和韩国的对外援助管理机构,他指出,中韩两国的对外援助工作都是由若干机构共同完成的。中国的对外援助是由商务部归口管理的,财政部、外交部等诸多部门都各自开展对外援助活动,彼此之间互不约束,导致中国对外援助出现政出多门、多头管理的现象。这不仅降低了援助的决策和执行效率,而且导致援助资源的分配无法达到最优化,援助资源浪费严重。韩国也出现了有关部门“撞车”的现象。正因如此,中韩两国应该进一步推进和完善援助部门间的协调机制,尽力避免援助资源的浪费,提高援助的有效性。美国的对外援助管理框架也存在这个问题,即美国的对外援助机构众多,缺乏高级别的对外援助机构从宏观上负责对外援助政策的制定,以及所有项目的管理、监督,各个机构之间也没有有效的合作机制。因此,中国应该设立一个高级别的、专门性的对外援助机构(孙明霞,2015)。刘培龙、王昱(2015)^②更激进地建议,中国应该把设立一个独立的对外援助机构,统一对外援助提上议事日程,即将分散在各个部门的对外援助工作集中到一个部门统一管理,解决各部门分头实施、多点对外的问题。

在援助的监督和评估体系方面,曹俊金、薛新宇(2015)^③指出,中国目前还不具备完善的对外援助监督评价体系,虽然已有一些对援外活动进行监督和评价的规则,但既没有独立的评价机构,也没有可操作的规范,对援助有效性的评价也规定的不够详尽。他们考察了美国、日本的对外援助监督评价机制和WTO贸易援助评价机制,建议中国应从对外援助监督评价理论研究、对外援助立法、对外援助监督评价机构设置以及对外援助实效考核等方面入手,完善中国的对外援助监督评价制度。周源、石婧(2015)^④专门、系统地研究了日本的对外援助评价体系,包括其发展历程、评价标准、实施体制等,他们建议中国应该高度重视建立一套科学和透明的对外援助评价体系。具体而言:建立分地区、分国别、分领域、分援助方式等不同层次和视角的对外援助评价制度,确立可操作的外援评价标准,确保事前、事中和事后评价的一致性,积极引入第三方评估,充分利用对外援助评价的结果等。

(2) 援助的具体政策

援助的具体政策即援助的分配问题,涉及援助方式、援助地区、援助部门等。与往年侧重于介绍发达国家的援助政策的情况不同,2015年学术界普遍开始关注和探究中国的对外援助政策。学者们几乎一致地认为,中国的对外援助政策应该做出调整,以适应新时期的援助实践和要求。其中,雷兴长(2015)^⑤强调,有必要对中国对外援助事业发展战略进行如下积极但适度的调整。一是对外援助的资金拨付由无偿援助为主转变为以政府优惠贷款为主。二是对外援助领域由生产部门援助为主转变为以基础设施援助为主。三是对外医疗援助由无偿援助为主转变为现代服务贸易为主。四是对外援助方式以物资技术援助为主转变为以人员

① 田文(2015):“中韩两国对外援助的对比与分析”,《国际工程与劳务》,第12期,第68-72页。

② 刘培龙、王昱(2015):“中国对外卫生援助决策和管理机制的演变”,《国际政治研究》(双月刊),第2期,第61-72页。

③ 曹俊金、薛新宇(2015):“对外援助监督评价制度:借鉴与完善”,《国际经济合作》,第4期,第20-26页。

④ 周源、石婧(2015):“日本官方发展援助的评价体系及其借鉴意义”,《国际经济合作》,第10期,第86-91页。

⑤ 雷兴长(2015):“中国对外援助的战略调整问题探讨”,《甘肃社会科学》,第3期,第202-205页。



培训为主。五是对外援助的主体由中央政府为主转变为政府、企业、慈善机构、个人等多元主体。六是对外援助动因由政治因素为主转变为以经济因素为主。七是对外援助活动以无条件援助为主转变为以有条件援助为主。八是对外援助时间由长期援助为主转变为以短期援助为主。于晓莉(2015)^①更深入地分析了中国的对外援助政策,提出了如下更为详细的调整方案。一是援助的重点区域应该集中于周边国家、非洲发展中国家和全天候的朋友。二是科学调整对外援助中无偿援助、无息贷款、优惠贷款的结构和比例。无偿援助相当于无条件的赠款,不需要偿还且资金有限,所以应该重点拨付给极端贫困和落后的受援国,而且主要用于投资资金需求小的公益项目;无息贷款和政府优惠贷款都是主要提供给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好的发展中国家,前者主要用于投资受援国大型的社会公共设施和民生项目,后者则主要用于投资受援国带有一定经济效益的大型生产项目或经济基础设施建设。三是援助的重点领域应该集中于技术传播、人才培养、节能环保、医疗等领域。

4. “一带一路”与中国对外援助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逐步推进,其与中国对外援助之间的互动也成为学者关注的热点。总体来讲,学者们普遍认为,中国对外援助应当按照构建“一带一路”的要求去调整,改革现有的对外援助策略和方式。例如,王飞(2015)^②在研究“丝绸之路经济带”时指出,根据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要求,中国的对外援助中要逐步增加对中亚国家的援助,并调整和改革对外援助的策略和方式,包括项目援助是基础,技术援助要加强,开展(准)军事合作和援助,对中亚国家的援助仍应以基础设施援助为主,但应当逐渐提高民生援助的比重,鼓励非政府组织开展对外援助等。白云真(2015)^③全面分析了“一带一路”战略,认为中国对外援助的政策框架与战略规划需要服务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四大目标,满足其五大特点。对此,中国决策者需要以“一带一路”倡议为指导,完善中国对外援助的政策框架,制定中国对外援助战略规划(2016—2020年),确定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中长期国别援助行动计划,动态地监督和评估援助的政策和活动,加强公私部门之间的合作,提出“共同发展伙伴关系”倡议,积极发挥和提高三方合作的作用,以全球视野、世界眼光提高援助项目的有效性与质量,从而创新对外援助模式,更好地提升对外援助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战略地位并使其成为重要支柱。

5. 气候变化援助

秦海波等(2015)^④深入分析比较了美国、德国和日本开展的气候变化援助,总结归纳了三国的重点经验,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国际气候变化援助的历史演进以及2012年后的发展趋势。最后,文章结合研究发现以及中国的现实国情提出了几点政策建议:重视气候变化援助在气候外交中的重要作用,将南南气候合作上升为国家战略;增加对别国的气候变化援助,将气候变化援助逐步纳入对外援助的范畴;创新气候变化融资机制,确保气候变化援助主体

^① 于晓莉(2015):“我国对外援助的环境与应对策略分析”,《中国经贸导刊》,第5期,第29-30页。

^② 王飞(2015):“复兴丝绸之路与中国对外援助”,《黑龙江民族丛刊(双月刊)》,第2期,第48-53页。

^③ 白云真(2015):“‘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对外援助转型”,《世界经济与政治》,第11期,第53-71页。

^④ 秦海波等(2015):“美国、德国、日本气候援助比较研究及其对中国南南气候合作的借鉴”,《中国软科学》,第2期,第22-34页。

和资金来源的多元化；积极鼓励和支持私人部门、民间社会团体和公众参与气候变化援助行动。冯存万（2015）^①在清晰界定气候变化援助的内涵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中国对外气候变化援助的三个发展阶段，以及中国气候变化援助的外交理念、政策部署及意义，并提出了促进中国气候变化援助的建议。例如，提高气候变化援助的战略地位，建立气候变化援助的长效机制和制度安排，深化南南气候合作，创新气候治理的技术等。

（二）国外文献述评

国外对国际发展援助的探讨主要还是集中于传统的援助问题^②，如援助的有效性、援助的分配/提供，唯一新增的议题就是援助的协调问题，而实际上协调的初衷和目的也是为了提高援助有效性。而且，援助的有效性依然还是重点研究援助与经济增长、援助与贸易投资、援助与政府行为/民主，只是2015年对援助与受援国的政府治理和民主的关注多于往年。与国内研究不同的是，国外学者在研究援助问题时，更加倾向于采用理论模型或实证方法开展定量分析，研究方法比国内单纯的定性分析相对更为科学，这是国内学者需要加强的地方。

1. 援助的有效性

（1）援助与经济增长

国外关于援助对经济增长的效果方面的研究一直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2015年这种争论仍然在继续，但大多赞成援助对经济增长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或在一定条件下有促进作用，抑或促进作用不显著，基本上不再有文献提出援助会阻碍受援国的经济增长。

有些学者研究得出，对外援助能够促进受援国的经济增长或收入提高。其中，Lof, Mekasha & Tarp (2015)^③研究了援助对受援国收入的影响，他们构建了一个面板VAR模型，采用Nowak-Lehmann, Dreher, Herzer, Klasen & Martinez-Zarzoso (NDHKM, 2012)^④的受援国数据库并改进了NDHKM的单方程回归方法，实证研究发现，援助在长期中能够显著促进受援国国民收入的提高。Arndt, Jones & Tarp (2015)^⑤除了考察了援助对受援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还同时分析了援助对受援国的社会发展、结构改革和贫困削减等的效应。他们构建了一个一般结构模型，采用78个受援国1970—2007年的面板数据，研究得出，援助能够促进受援国的产出增长，能够促进受援国的结构改革，减少其贫困降低农业的比例、提高工业占比，但对社会不平等没有显著影响；渠道分析发现，援助会通过改善受援国的人力资本和物资本水平这些渠道，为增长培养动力、促进经济增长。有文章指出，援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可能会随国家样本、研究方法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因而有些学者选择采用特定受援国家的样本甚至国家级以下层面的样本检验援助的经济增长效应。例如，Askarov &

① 冯存万（2015）：“南南合作框架下的中国气候援助”，《国际展望》，第1期，第34—51页。

② 而且这些援助文献主要集中发表在 *World Development* 期刊上。

③ Lof, M., Mekasha T. J. & Tarp, F. (2015). Aid and Income: Another Time-series Perspective. *World Development*, 69: 19–30.

④ Nowak-Lehmann, F., Dreher, A., Herzer, D., Klasen, S. & Martinez-Zarzoso. (2012). Does foreign aid really raise per capita income? A time series perspective.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45 (1), 288–313.

⑤ Arndt, C. A., Jones S. & Tarp F. (2015). Assessing Foreign Aid's Long-Run Contribution to Growth and Development. *World Development*, 69: 6–18.



Doucouliaos (2015)^① 考察了援助对转型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他们采用 32 个转型经济体 1990—2012 年的面板数据, 采用工具变量方法和援助的滞后项解决援助的内生性, 并基于 GMM 方法, 实证研究认为: 援助能够显著促进转型国家的经济增长且不存在非线性关系, 当控制了样本、估计方法以及圆柱的内生性之后, 该结论依然成立; 同时, 援助有效性并不依赖于受援国好的政策。Dreher & Lohmann (2015)^② 则采用 21 个受援国 478 个一级管理区域和 8400 个二级管理区域 2000—2011 年的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 利用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方法, 研究发现, 无论在国家层面, 还是一级和二级层面, 援助都能够显著促进受援国的经济增长, 但二级区域的援助促进效应要大于一级和国家层面。

有学者认为援助对经济增长没有显著影响。Veiderpass (2015)^③ 选取 89 个中低收入受援国 1994—2004 年间 11 年的数据, 并采用 bootstrapping 将这些国家划分为生产率提高、生产率下滑、生产率不变三个国家类别, 对三个国家组的检验结果显示, 援助与生产率变化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正向或负向关系。

也有学者将援助与其他因素放在一起进行研究, 试图找出援助到底在什么条件下才有效。Nwaogu & Ryan (2015)^④ 采用 53 个非洲国家和 34 个拉美国家的数据, 利用动态空间面板数据模型, 研究了援助、FDI 和汇款会受援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他们研究发现, 如果将三个变量单独对经济增长回归, 则援助和 FDI 能够促进非洲国家的经济增长, 但如果把三者放在一起进行回归, 则只有 FDI 对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对于拉美国家来讲, 单独回归时援助和汇款显示出积极的经济增长促进效应, 而当三者一起回归时只有汇款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他们还指出, 由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依赖于邻国, 因此国家在空间上的相互依赖性会影响一国的经济增长。Bandyopadhyay, Lahiri & Younas (2015)^⑤ 研究了援助和外国私人贷款对受援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他们采用 131 个发展中国家 1996—2010 年的面板数据, 并同时基于最小二乘估计 (OLS)、广义可行最小二乘估计 (FGLS)、一阶差分回归、动态 GMM (DGMM) 和系统 GMM (SGMM) 回归方法以及划分国家子样本等检验了回归结果的有效性。研究发现, 援助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呈收益递减态势, 私人贷款则呈收益递增态势; 这两种国家转移具有“临界值”效应, 即当且仅当国际转移低于该临界值时, 援助的边际效应才会大于私人贷款; 援助和私人贷款之间的促进效应是互补的。他们还指出, 如果把援助划分为赠款和优惠贷款, 那么赠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 U 型效应。

援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可能受到施受双方的政治、文化、距离等因素的影响。Dreher et al (2015)^⑥ 研究了援助国和受援国的意识形态差异对援助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影响。

① Askarov, Z. & Doucouliagos, H. (2015). Development Aid and Growth in Transition Countries. *World Development*, 66: 383–399.

② Dreher, A. & Lohmann, S. (2015). Aid and growth at the regional level.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31 (3–4), 420–446.

③ Veiderpass, A. (2015). Foreign aid and productivity. *J Prod Anal*, 43: 249–258.

④ Nwaogu, U. G. & Ryan, M. J. (2015). FDI, Foreign Aid, Remittanc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 (1), 100–115.

⑤ Bandyopadhyay, S., Lahiri, S. & Younas, J. (2015). Financing growth through foreign aid and private foreign loans: Nonlinearities and complementariti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56: 75–96.

⑥ Dreher, A., Minasyan, A. & Nunnenkamp, P. (2015). Government ideology in donor and recipient countries: Does ideological proximity matter for the effectiveness of aid?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79: 80–92.

他们基于 67 个受援国 1975—2010 年的面板数据, 构建了一阶差分模型, 援助国和受援国之间的意识形态越相近, 那么彼此之间的信任度就越高, 越能够降低交易成本, 因此意识形态相近会扩大援助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促进作用。Duttaa, Mukherj & Roy (2015)^① 采用 120 个受援国 1979—2008 年的数据, 利用动态面板系统 GMM 方法, 实证检验了受援国的政治稳定性会如何影响对外援助对受援国的资本形成的影响效应。研究证实, 在政治稳定的前提下, 援助才能够促进受援国的资本形成, 而且这种促进效应呈收益递减趋势。

(2) 援助与贸易投资

在援助与国际贸易方面, Nanivazo & Lahiri (2015)^② 运用一个两阶段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模型, 实证检验了对外援助是否会引引起受援国的贸易政策改革。在该模型中, 受援国在第一阶段选择贸易政策, 援助国根据受援国第一阶段的政策决定第二阶段的援助承诺, 援助国的信号会影响受援国的贸易政策调整; 根据援助国是积极的还是被动的 (即是否会主动选择无条件援助和捆绑援助的比重以获得最优化) 以及施受双方是依次行动还是同时行动, 他们考虑了三种情形。研究结果表明, 无条件援助能够充分地促使受援国降低最优关税水平, 而且当援助国是积极的时候, 无条件援助降低关税的概率会下降。与此同时, 他们还发现, 对于一个积极的援助国而言, 当它先于受援国行动, 而不是一起行动时, 它的最优捆绑援助的比重更高。Jayaraman, Choong & Chand (2015)^③ 采用斐济 1980—2012 年的时间序列, 构建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 (ARDL), 检验了援助和汇款是否会引发斐济的“荷兰病效应”, 从而阻碍其出口。回归结果显示, 援助和汇款会显著导致斐济的货币升值, 说明援助导致了斐济的“荷兰病效应”, 从而会阻碍它的出口。在援助与 FDI 方面, Arazmuradov (2015)^④ 检验了 1993—2008 年援助对中亚国家 FDI 流入量的影响。他们构建了一个简单的面板数据, 实证检验发现, 援助与 FDI 流入量之间存在稳健的互补关系; 受援国国内投资的增加会挤出 FDI 流入量, 而发展援助的增加可以抵消国内投资对 FDI 流入的这种挤出效应。

(3) 援助与民主政治

这一领域的文献主要研究对外援助是否会影影响受援国的政府治理水平, 如政府的腐败行为, 或者是否能够促进受援国的民主化进程等等。例如, Rahim, Arshad & Sudhir (2015)^⑤ 探究了对外援助与受援国的腐败之间的关系。他们采用南亚和东亚 14 个受援国 1996—2013 年的面板数据, 实证研究发现, 援助能够显著降低受援国的腐败程度, 且多边援助对腐败的

① Duttaa, N., Mukherj, D. & Roy, S. (2015). Re-exami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omestic investment and foreign aid: does political stability matter?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pplied Economics*, 29 (3), 259 - 286.

② Nanivazo, M. & Lahiri, S. (2015). Promoting Trade Liberalization: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Foreign Aid as Prize.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 (3), 748 - 757.

③ Jayaraman, T. K., Choong, C. K. & Chand, P. (2015). Do foreign aid and remittance inflows hurt competitiveness of exports of Pacific island countries? An empirical study of Fiji. *Journa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41 (2), 111 - 125.

④ Arazmuradov, A. (2015). Can development aid help promot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Evidence from Central Asia. *Economic Affairs*, 35 (1), 123 - 136.

⑤ Rahim, Q., Arshad, A. & Sudhir, T. (2015). Impact of Foreign Aid on Corruption: An Econometric Case Study of South Asia and East Asia. *Global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9 (4), 17 - 30.



阻碍作用要好于双边援助。不过, Menarda & Weillb (2016)^① 采用 71 个受援国 1996—2009 年的面板数据, 运用动态 GMM 估计和因果关系检验方法, 研究结果并未显示援助与受援国的腐败之间存在关联性或因果关系。

Askarov & Doucouliagos (2015)^②、Clark, Barak & Ryan (2015)^③ 研究了对外援助对受援国民主程度和政府治理的影响效应。其中, Askarov & Doucouliagos (2015) 采用 32 个转型国家 1990—2012 年的面板数据, 构建了援助的非线性模型研究得出, 对外援助对受援国的民主化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且该促进作用呈现倒“U”型的非线性效用; 利用渠道分析发现, 援助的积极促进作用是通过约束政府的执行力和提高政治参与来实现的。与此同时, 研究结果显示, 整体援助对受援国的总体政府治理质量没有影响, 而美国援助会损害受援国政府治理的某些维度。Clark, Barak & Ryan (2015) 采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 1991—1999 年的面板数据, 实证研究也发现援助有利于提高受援国的民主化程度, 援助的确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非洲民主自由化进程的时间和程度问题。

(4) 援助政策协调

发展政策协调是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s) 的重要目标之一, 也是提高援助有效性的重要手段之一。因此, 援助政策的协调问题应该引起各界的重视。Han & Archibugi (2015)^④ 利用 110 个中低收入国家 1990—2010 年的面板数据, 以及 GMM 估计方法, 研究了援助碎片化 (以援助国的数量来衡量) 对受援国儿童死亡率的影响。研究表明, 一个拥有中等数量的援助国, 会比拥有较少或较多的援助国的受援国表现更好, 即援助国数量与受援国的表现之间存在倒“U”关系。这暗示援助碎片化会阻碍援助对受援国产出的促进作用, 援助国之间应该加强协调。进一步地, Bourguignon & Platteau (2015)^⑤、Fuchs, Nunnenkamp & Ohler (2015)^⑥ 深入分析了影响援助国之间协调的困难和因素, 如出口竞争、政治支持、集体行动困境等等。

综上所述, 我们可以发现, 截至目前, 关于“援助是否有效”这一问题, 学术界仍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究其原因, 与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所选取的样本、考察时点等因素密切相关。研究方法不同、样本差异、考察时间变化, 都可能导致估计结果出现差异。这暗示我们, 考察援助的有效性时, 不能单纯地根据已有研究妄下结论。与此同时, 在自身开展研究时, 应该尽可能选择较长的时间段, 样本选择上也要基于不同考察主体的特殊性。例如, 针对不同地区以及不同收入水平的受援国, 应该分别检验; 对于较长的时间段, 应该考虑分段检验;

① Menarda, A. R. & Weillb, L. (2015). Understanding the link between aid and corruption: A causality analysis. *Economic Systems*, 40: 260–272.

② Askarov, A. & Doucouliagos, H. (2015). Aid and institutions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38: 55–70.

③ Clark, G., Barak, H. & Ryan, G. (2015). Did Aid Promote Democracy in Africa? The Role of Technical Assistance in Africa's Transitions. *World Development*, 68: 323–335.

④ Han, L. & Archibugi, M. K. (2015). Aid Fragmentation or Aid Pluralism? The Effect of Multiple Donors on Child Survival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1990–2010. *World Development*, 76: 344–358.

⑤ Bourguignon, F. & Platteau, J. P. (2015). The Hard Challenge of Aid Coordination. *World Development*, 69: 86–97.

⑥ Fuchs, A., Nunnenkamp, P. & Ohler, H. (2015). Why Donors of Foreign Aid Do Not Coordinate: The Role of Competition for Export Markets and Political Support. *The World Economy*, 10: 255–285.

应当尽可能地采用更细一级如国家内部层面甚至项目层面的数据等等。

2. 援助分配

援助的分配主要分析援助的配置方法以及影响援助配置的因素。援助国自身的需求和期望会直接影响其援助决策。Jones (2015)^① 采用 23 个 DAC 援助国 1960—2009 年的对外援助数据,运用面板协整模型,分析了影响援助配置的因素,包括援助国和受援国的因素。研究发现,不同援助国在不同时期的援助策略存在很大差异;尽管存在异质性,但是援助国提供援助时具有攀比效应,即会在相同的时间增加或者减少援助;援助国自身的宏观经济条件在短期内会影响其援助供给,如援助提供服从顺周期特征,财政紧缩时期会缩减援助等;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援助投入到受援国的安全、民主领域。

受援国的因素也会影响援助国的援助配置决策,Lopez (2015)^②、Winters & Martinez (2015)^③ 研究了受援国的腐败和治理能力与援助流入之间的关系。其中,Lopez (2015) 运用 23 个援助国、180 个受援国 1999—2010 年的数据,构建了一个三边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受援国的腐败程度与援助流入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援助与腐败程度之间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受援国的腐败会减少援助国对其提供的援助;不过,不同部门的援助与腐败之间的关系不同,腐败程度高的国家会收到更多的人道主义援助,生产部门援助和社会基础设施援助则会减少。Winters & Martinez (2015) 采用 2004—2010 年 AidData 数据库项目层面的数据,探究了腐败和治理水平会如何影响援助国在不同援助方式和援助部门之间的配置。研究结论表明:援助国的确会为治理水平高的受援国提供更多援助,并且会使用更多的援助方式,投入更多的援助部门;同时,在治理能力好的受援国,援助国会用方案援助替代技术援助和项目援助方式,并用大型基础设施援助替代社会部门援助。Acht et al. (2015)^④ 进一步指出,对于腐败程度较高、治理能力较差的受援国,援助国倾向于绕过受援国的政府部门,转而更多地通过非政府部门提供援助。

三、简评

本文从经济发展与就业和发展援助两个方面回顾了 2015 年经济发展领域的研究进展。其中,经济发展与就业领域的主要话题包括宏观经济形势与劳动力市场、贸易对就业的影响、就业匹配问题、工资决定和收入分配以及移民五个方面。国际文献对这个领域的关注重点在于微观就业匹配问题和贸易对就业的影响;而国内文献对这个领域的关注重点在于工资决定与收入分配和移民问题。就援助方面的文献而言,2015 年关于援助的文章,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超过了以往年份,这与联合国 2030 年发展议程的提出和通过密切相关。尤其是,越来

① Jones, S. (2015). Aid Supplies Over Time: Addressing Heterogeneity, Trends, and Dynamics. *World Development*, 69: 31–43.

② Lopez, L. (2015). Corruption and international aid allocation: A Complex Dance. *Journa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40 (1), 35–61.

③ Winters, M. S. & Martinez, G. (2015). The Role of Governance in Determining Foreign Aid Flow Composition. *World Development*, 66: 516–531.

④ Acht, M., Mahmoud, T. O. & Thiele, R. (2015). Corrupt governments do not receive more state-to-state aid: Governance and the delivery of foreign aid through non-state actor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14: 20–33.



越多的国内学者开始关注国际发展援助相关的问题,一改往年那种国外文献远远超过国内文献的情况。这意味着,国际发展援助问题已经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发展议题在核心文献中的比重会逐渐上升。

综合而言,国际与国内在关注点上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与经济背景有很大的关系。就全球经济与就业形势而言,全球经济放缓、结构转型是发达与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失业总量持续增加,贸易方式的转变也使得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面临不同的挑战,在这种大背景下,贸易对就业的影响和就业匹配问题是国际上研究的当然热点问题。与此相比,中国近年来已进入了一个“新常态”的发展阶段,经济增长速度显著下降,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规模日趋稳定,但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不高导致劳动与资本的配置仍然缺乏效率,工资决定与收入分配以及移民问题是中国国情下就业领域面临的最为关键的问题,进一步深化经济结构调整、推动城镇化进程是政策和理论界共同关注的热点,也需要更翔实且有建设性的研究成果。

与国际相比,国内对于发展问题的研究方法目前还存在一定的距离。整体来看,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学者们都愈加倾向于采取定量方法考察发展问题,以期获得更准确的研究结果,尤其是国内学者。然而与国际文献相比,国内研究明显受制于微观数据的可得性。以 Helpman 等(2015)为例,文章采用了巴西 RAIS 数据考察贸易对于收入不平等的影响,该数据将十三年时间里的企业与就业者匹配起来,同时记录企业经营、进出口等综合情况和工人的就业、人口基本特征;与此相比,张川川(2015)考察了类似的问题,却只能采用行业层面的进出口数据度量贸易的情况。目前在研究就业相关问题的文献中,文献多是将宏观汇总数据与微观数据进行匹配、推断就业需求的一般性变动、并捕捉这种变动的的影响。这些对就业需求变动的测度通常是准确且有理论依据的,但一方面宏观数据容易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在估计需求变动下就业的动态变化时难以做深入的分析。与此类似,由于中国对外援助数据的缺失,国内学者几乎无一例外地采取定性方法研究发达国家和中国的对外援助问题,这导致援助领域的研究一直不太规范,研究结论也分歧较大。国内关于发展援助的定量研究的文献十分稀少,而且更多是对国外文献的引用借鉴。

在发展研究上,总结国际上具有实践价值的经验、归纳中国经验并上升到理论模型的研究仍然缺乏。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结构改革和产业结构升级都日渐重要的新时期,将国际成熟的理论模型与中国问题解决结构性改革中产生的就业问题,同时在经济仍然在中速增长的阶段不断总结我国即有就业问题的特点、归纳这些问题的一般性并用理论进行解释,是推广中国发展经验、“讲好中国故事”的研究实践。在发展援助的研究上,现有国际和国内的文献大多都是采用实证模型检验援助的效果,但理论模型非常匮乏。关于国际发展援助方面的理论架构尚未建立,相关的理论机制分析也很不完善。这一方面是因为援助本身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外交甚至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并非每个因素都能够模型化;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发展经济学本身就一直缺乏一套属于自身的理论框架,它的很多研究都是采用其他学科,如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等的框架展开的,因此援助问题也因缺乏理论积淀而没有形成理论体系。未来,学者应该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更多地尝试构建援理论框架,弥补援理论的不足。

发展经济学研究具有很强的政策环境敏感性,同时也具有重要的政策指导价值。联合国2030年发展议程和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对于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许多挑战。2030年发展议程作为指导未来全球和各国的可持续发展和国际发展合作的纲领

性文件，其对发展经济学理论研究的选题应该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未来，一方面应该从定性角度探究该议程对国际发展问题特别是新形势下国内的就业结构调整和国际发展援助的影响和要求；另一方面，可以尝试构建理论和实证模型，从定量角度详细研究 SDGs 具体指标对包括就业在内的具体领域的影响，以及最优援助方法和数量等问题。

英文参考文献

1. Acht, M. , Mahmoud, T. O. & Thiele, R. (2015) . Corrupt governments do not receive more state-to-state aid; Governance and the delivery of foreign aid through non-state actor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 114: 20 – 33.
2. Arazmuradov, A. (2015) . Can development aid help promot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Evidence from Central Asia. *Economic Affairs* , 35 (1) , 123 – 136.
3. Arndt, C. A. , Jones S. & Tarp F. (2015) . Assessing Foreign Aid's Long-Run Contribution to Growth and Development. *World Development* , 69: 6 – 18.
4. Askarov, A. & Doucouliagos, H. (2015) . Aid and institutions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 38: 55 – 70.
5. Askarov, Z. & Doucouliagos, H. (2015) . Development Aid and Growth in Transition Countries. *World Development* , 66: 383 – 399.
6. Bandyopadhyay, S. , Lahiri, S. & Younas, J. (2015) . Financing growth through foreign aid and private foreign loans: Nonlinearities and complementariti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 56: 75 – 96.
7. Bourguignon, F. & Platteau, J. P. (2015) . The Hard Challenge of Aid Coordination. *World Development* , 69: 86 – 97.
8. Clark, G. , Barak, H. & Ryan, G. (2015) . Did Aid Promote Democracy in Africa? The Role of Technical Assistance in Africa's Transitions. *World Development* , 68: 323 – 335.
9. Coles, M. G. & Mortensen, D. T. (2015) . Equilibrium Labor Turnover, Firm Growth, and Unemployment. *Econometrica* , 2016, 84 (1) , 347 – 363.
10. Dixcarneiro, R. & Kovak, B. K. (2015) .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the Skill Premium: A Local Labor Markets Approac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 105 (5) , 551 – 557.
11. Dreher, A. & Lohmann, S. (2015) . Aid and growth at the regional level.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 31 (3 – 4) , 420 – 446.
12. Dreher, A. , Minasyan, A. & Nunnenkamp, P. (2015) . Government ideology in donor and recipient countries: Does ideological proximity matter for the effectiveness of aid?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 79: 80 – 92.
13. Dutta, N. , Mukherj, D. & Roy, S. (2015) . Re-exami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omestic investment and foreign aid: does political stability matter?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pplied Economics* , 29 (3) , 259 – 286.
14. Farber, H. S. & Valletta, R. G. (2015) . Do extended unemployment benefits lengthen unemployment spells? Evidence from recent cycles in the US labor market.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 50 (4) , 873 – 909.
15. Fuchs, A. , Nunnenkamp, P. & Ohler, H. (2015) . Why Donors of Foreign Aid Do Not Coordinate: The Role of Competition for Export Markets and Political Support. *The World Economy* , 10: 255 – 285.
16. Gayle, G. L. , Golan, L. & Miller, Robert A. (2015) . Promotion, Turnover, and Compensation in the Executive Labor Market. *Econometrica* , 83 (6) , 2293 – 2369.
17. Hainmueller, J. , Hiscox, M. J. & Margalit, Y. (2015) . Do Concerns About Labor Market Competition Shape Attitudes Toward Immigration? New Evidence. *SSRN Electronic Journal* , 97 (1) , 193 – 207.
18. Han, L. & Archibugi, M. K. (2015) . Aid Fragmentation or Aid Pluralism? The Effect of Multiple Donors on Child Survival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1990 – 2010. *World Development* , 76: 344 – 358.
19. Helpman, E. & Itskhoki, O. (2015) .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Labor Market Dynamics with Heterogeneous

Firms (No. 199161) .

20. Helpman, E. , Itskhoki, O. , Muendler, M. & Redding, S. (2015) . Trade and Inequality: From Theory to Estimation,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forthcoming) .

21. Jayaraman, T. K. , Choong, C. K. & Chand, P. (2015) . DO foreign aid and remittance inflows hurt competitiveness of exports of Pacific island countries? An empirical study of Fiji. *Journa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41 (2), 111 - 125.

22. Jones, S. (2015) . Aid Supplies Over Time: Addressing Heterogeneity, Trends, and Dynamics. *World Development*, 69: 31 - 43.

23. Kaas L & Kircher P. (2015) . Efficient Firm Dynamics in a Frictional Labor Market.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5 (10), 3030 - 3060.

24. Lof, M. , Mekasha, T. J. & Tarp, F. (2015) . Aid and Income: Another Time-series Perspective. *World Development*, 69: 19 - 30.

25. Lopez, L. (2015) . Corruption and international aid allocation: A Complex Dance. *Journa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40 (1), 35 - 61.

26. Mao, R. & Xu, J. (2015) . Labor Market Dynamics and Structural Change: Evidence from China. *China & World Economy*, 23 (4), 60 - 83.

27. Menarda, A. R. & Weillb, L. (2015) . Understanding the link between aid and corruption: A causality analysis. *Economic Systems*, 40: 260 - 272.

28. Nanivazo, M. & Lahiri, S. (2015) . Promoting Trade Liberalization: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Foreign Aid as Prize.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 (3), 748 - 757.

29. Nowak-Lehmann, F. , Dreher, A. , Herzer, D. , Klasen, S. & Martinez-Zarzoso (2015) . Does foreign aid really raise per capita income? A time series perspective.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45 (1), 288 - 313.

30. Nwaogu, U. G. & Ryan, M. J. (2015) . FDI, Foreign Aid, Remittanc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 (1), 100 - 115.

31. Rahim, Q. , Arshad, A. & Sudhir, T. (2015) . Impact of Foreign Aid on Corruption: An Econometric Case Study of South Asia and East Asia. *Global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9 (4), 17 - 30.

32. Ruiz, I. & Vargassilva C. (2015) . The Labor Market Impacts of Forced Migr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5 (5), 581 - 586.

33. Veiderpass, A. (2015) . Foreign aid and productivity. *Journal of Productivity Analysis*, 43: 249 - 258.

34. Winters, M. S & Martinez, G. (2015) . The Role of Governance in Determining Foreign Aid Flow Composition. *World Development*, 66: 516 - 531.

中文参考文献

1. 白云真 (2015): “‘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对外援助转型”, 《世界经济与政治》, 第11期, 第53 - 71页。

2. 曹俊金、薛新宇 (2015): “对外援助监督评价制度: 借鉴与完善”, 《国际经济合作》, 第4期, 第20 - 26页。

3. 陈雪原 (2015): “关于‘双刘易斯二元模型’假说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中国农村经济》, 第3期, 第34 - 43页。

4. 陈钊、冯净冰 (2015): “应该在哪里接受职业教育: 来自教育回报空间差异的证据”, 《世界经济》, 第8期, 第132 - 149页。

5. 都阳 (2015): “低生育率时代的经济发展: 结构、效率与人力资本投资”, 《国际经济评论》, 第2期, 第120 - 133页。

6. 冯存万 (2015): “南南合作框架下的中国气候援助”, 《国际展望》, 第1期, 第34 - 51页。

7. 郭凯明、颜色 (2015): “劳动力市场性别不平等与反歧视政策研究”, 《经济研究》, 第7期, 第

42-56页。

8. 韩召颖、田光强(2015):“试评近年日本对缅甸官方发展援助政策”,《现代国际关系》,第5期,第33-40页。

9. 弘义(2015):“欧盟对非洲援助政策调整及其前景”,《国际研究参考》,第10期,第1-7页。

10. 胡兵、丁祥平、邓富华(2015):“中国对非援助能否推动对非投资”,《当代经济研究》,第1期,第67-73页。

11. 胡美(2015):“对外援助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述评”,《武陵学刊》,第2期,第23-32页。

12. 黄梅波、朱丹丹(2015):“国际发展援助的出口多样化促进效应分析——基于66个受援国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财贸经济》,第2期,第97-108页。

13. 黄宁(2015):“论对外直接投资与发展援助的互动发展”,《印度洋经济体研究》,第1期,第96-108页。

14. 蒋华杰(2015):“中国援非医疗队历史的再考察(1963—1983)——兼议国际援助的效果与可持续性”,《外交评论》,第4期,第61-81页。

15. 雷兴长(2015):“中国对外援助的战略调整问题探讨”,《甘肃社会科学》,第3期,第202-205页。

16. 李丹、陈友庚(2015):“对外援助与我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开放导报》,第1期,第51-53页。

17. 李家成(2015):“‘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国对外援助政策”,《环球视线》,第11期,第47-49页。

18. 李树、陈刚(2015):“幸福的就业效应——对幸福感、就业和隐性再就业的经验研究”,《经济研究》,第3期,第62-74页。

19. 刘洪武(2015):“对非发展援助与中国国际责任的当代实践”,《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第1-10页。

20. 刘培龙、王昱(2015):“中国对外卫生援助决策和管理机制的演变”,《国际政治研究》(双月刊),第2期,第61-72页。

21. 刘婷(2015):“中国对非洲援助的有效性分析”,《现代经济信息》,第2期,第120页。

22. 卢锋(2015):“劳动力市场与中国宏观经济周期:兼谈奥肯定律在中国”,《中国社会科学》,第12期,第69-89页。

23. 卢光盛、李晨阳、金珍(2014):“中国对缅甸的投资与援助:基于调查问卷结果的分析”,《南亚研究》,第1期,第17-30页。

24. 罗会钧、黄梦佳(2015):“美国对非洲援助研究”,《政治研究》,第6期,第73-75页。

25. 吕世斌、张世伟(2015):“中国劳动力‘极化’现象及原因的经验研究”,《经济学(季刊)》,第2期,第757-778页。

26. 彭国华(2015):“技术能力匹配、劳动力流动与中国地区差距”,《经济研究》,第1期,第99-110页。

27. 秦海波、王毅、谭显春、黄宝荣、C. L. Gandenberger、Ninck Freiherr Von B. (2015):“美国、德国、日本气候援助比较研究及其对中国南南气候合作的借鉴”,《中国软科学》,第2期,第22-34页。

28. 沈鹏、周琪(2015):“美国对以色列和埃及的援助:动因、现状与比较?”,《美国研究》,第2期,第9-31页。

29. 宋微(2015):“中国对外援助意义的再思考”,《国际经济合作》,第1期,第81-84页。

30. 宋扬、赵君(2015):“中国的贫困现状与特征:基于等值规模调整后的再分析”,《管理世界》,第10期,第65-77页。

31. 孙明霞(2015):“美国对外援助机制及其对中国的启示”,《国际展望》,第4期,第136-156页。

32. 唐慧云(2015):“从政治利益走向经济利益——试析中国对外援助政策的转变”,《探索》,第6期,第234-251页。



33. 田文 (2015): “中韩两国对外援助的对比与分析”, 《国际工程与劳务》, 第12期, 第68-72页。
34. 汪仕凯 (2015): “全球劳工治理: 议题、机制与挑战”, 《世界经济与政治》, 第8期, 第66-87页。
35. 王飞 (2015): “复兴丝绸之路与中国对外援助”, 《黑龙江民族丛刊 (双月刊)》, 第2期, 第48-53页。
36. 王丽 (2015): “国家援助及双边贸易的效应分析”, 《赤峰学院学报 (自然科学版)》, 第4期, 第160-162页。
37. 王学龙、袁易明 (2015): “中国社会代际流动性之变迁: 趋势与原因”, 《经济研究》, 第9期, 第58-71页。
38. 王玉红 (2015):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背景下以援助方式促进内蒙古与蒙古国的经贸合作研究”, 《赤峰学院学报》, 第4期, 第130-132页。
39. 魏下海、董志强、金钊 (2015): “工会改善了企业雇佣期限结构吗? ——来自全国民营企业抽样调查的经验证据”, 《管理世界》, 第5期, 第52-62页。
40. 严双伍、唐鹏镐 (2015): “促贸援助: 国际比较与政策建议”, 《长江论坛》, 第3期, 第49-55页。
41. 燕雪 (2015): “驳中非合作是‘新殖民主义论’”, 《法治与社会》, 第9期 (下), 第279-287页。
42. 姚帅 (2015): “透视日本对外援助新政策”, 《国际经济合作》, 第5期, 第63-66页。
43. 于晓莉 (2015): “我国对外援助的环境与应对策略分析”, 《中国经贸导刊》, 第5期, 第29-30页。
44. 袁志刚、高虹 (2015): “中国城市制造业就业对服务业就业的乘数效应”, 《经济研究》, 第7期, 第30-41页。
45. 张川川 (2015): “出口对就业、工资和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基于微观数据的证据”, 《经济学 (季刊)》, 第4期, 第1611-1630页。
46. 张勉励 (2015): “中国对越南经济建设援助的历史考察 (1958—1964)”, 《史林》, 第1期, 第151-157页。
47. 周源、石婧 (2015): “日本官方发展援助的评价体系及其借鉴意义”, 《国际经济合作》, 第10期, 第86-91页。
48. 朱丹丹、黄梅波 (2015): “中国对外援助的贸易成本削减效应研究”, 《世界经济研究》, 第7期, 第100-107页。
49. 朱艳圣 (2015): “日本政府开发援助背后的战略分析”,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第5期, 第127-133页。

(编辑: 叶扬)